

编者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

2014年，广州将最后两个管辖县级市增城、从化改设为区，从此和南京一样，进入“无县时代”。

和上一波浪潮相比，在地域分布上，这波“撤县设区”更多地从沿海席卷到内陆城市。这是政策迁移的表现。两波浪潮的逻辑，没有本质差别：都是试图通过行政区划调整集中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大批完成实际“变身”的县，迫切等待撤县设市大门被彻底推开。

撤县设市冻结期，我国经济和城市发展都有很大提升和飞跃。解冻初期如果申请量有一个大增长，应是可理解的。

根据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2014年，国务院批复了28例撤县设区的申请。2015年截至8月1日，国务院批复了17例。此外，国务院在10月中旬正式批复了陕西省政府《关于渭南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同意撤销华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

更多的撤县设区申请还在民政部里“排队”。湖南怀化市规划局工作人员何方洪做了一个统计，截至2014年2月，有188个地方政府已上交撤县设区申请，等待批复。例如湖南怀化市的中方县，2013年底就交了改区申请，不过至今未获批。

本期推出“撤县设区”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新盼引起您的关注。

本期专题·撤县设区

- 02 “撤县设区”潮再起
- 06 2015撤县设市名单约200县排队申请
- 07 【2015年下半年已批设公布】
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地设市的名单

政坛经纬

- 08 学界叩问7年 政府账本公开有多难

经济纵横

- 13 二胎政策开放世界各育儿成本大P

人物春秋

- 14 青年毛泽东曾将何职业作为自己的志向

文化点击

- 16 朱大可：国学应从孝顺进化到孝爱

历史深处

- 18 1911年，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一）

悦读时光

- 封三 南街村模式能拯救贫穷的农村吗（二）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你要“省管县”强县扩权,我要“县改区”壮大城市

“撤县设区”潮再起



2015年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县级市富阳撤市设区。(CFP/图)

一些地级市急于撤县设区,是因为听到风声,担心“省管县”以后“地级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在调整后的五年内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到第五年几乎降到零。

“我们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太多而不是太少了。总是因为各种需要,不停调整改变行政区划。”

将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成“区”,纳入城

市行政区范围。这样的行政区划调整,每年全国会发生多少次?

在最“狂热”的2000年,这个数字是36,之后两年每年不少于20例。2004年至2011年是长达8年的低潮期,其中3年一例也没有发生。如今,“撤县设区”再掀浪潮。

根据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2014年,国务院批复了28例撤县设区的申请。2015年截至8月1日,国务院批复了17例。此外,南方周末记者从陕西渭南市华县民政局确认,国务院在10月中旬正式批复了陕西省政府《关于渭南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同意撤销华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

更多的撤县设区申请还在民政部里“排队”。湖南怀化市规划局工作人员何方洪做了一个统计,截至2014年2月,有188个地方政府已上交撤县设区申请,等待批复。例如湖南怀化市的中方县,2013年底就交了改区申请,不过至今未获批。

“后来的变动太大,统计没法精确了。有很多

新地方交申请，也有一会儿说县改区，一会儿说县改市的。”何方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看来，撤县设区的实质是为城市化留下后备空间。

“撤县设区很明白地就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一体的表征。”他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写道，“总的说来，我们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太多而不是太少了。”

和“省管县”赛跑

这一波撤县设区，潮起于“省管县”改革的步步深化。中国从1992年开始试行“省管县”改革。2009年财政部要求，在2012年底前，在全国（民族自治区除外）推开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改革。“省管县”开始从财政领域进入行政领域。

一位参与行政区划改革论证的匿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地级市急于撤县设区，是因为听到风声，担心“省管县”以后“地级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没有人明确说，但从我具体接触的一些案例来看，这种企图是存在的。”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李娜说，有的地级市怕它代管的县被省里全拿完，所以赶紧并成自己的区。

传统意义上的“县”是一种地域型政区，呈面状，与农业社会相对应。而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呈点状的城市型政区应运而生。

在中央层面，无论撤县设区还是撤县设（县级）市，都响应了“新型城镇化”的号角。

2013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并非多数县都能改市、改区。只有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集聚的人口，尤其是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并且各项经济总量指标达到城市化的程度，才构成撤县设市和撤县改区的条件。

目前参考的设市、设区标准制定于二十多年

前，2014年10月，民政部发布了市辖区设置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标准仍在酝酿中，“年内无法出台”。

但对地方而言，是否要撤县，撤县后到底设市还是设区，是一个真问题。并非标准具备就水到渠成。

2013年，浙江湖州市希望将长兴县改成区，引发县里集体抗议，两百多名老干部上书县委，县委四套班子全部反对。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八成财政留给自己，二成交给省里。若变成区，一半要交给湖州。（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5月16日《撤县设区？长兴不高兴》）

浙江是“省管县”的先行者，强县扩权，长兴原本打的是撤县设市的算盘。与湖州市矛盾公开后，无论设市、设区，都偃旗息鼓。一位当地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市里、县里换过一拨领导，在任者现对长兴撤县一事绝口不提。

“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是有冲突的。”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教师高琳分析，省直管县的目的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做大县。而撤县设区刚好相反，核心目的是增加城市的聚集效应，做大地级市经济。

和财政紧密关联的，还有土地。

江西南昌市南昌县将“做好撤县设市的申报工作”写进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但申请上交后遭到市里否决。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7月，南昌市长在会上痛陈南昌城市面积小，全国省会倒数。话音未落，国务院同意撤销南昌新建县，设立新建区，南昌市区面积扩容6倍。

2015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南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告知：“改市不可能了，上面不同意。我们也没有改区的打算，就是南昌县。”

市县博弈，剥夺还是反哺

较之湖州长兴“县改区”风波，同样是在浙江，2014年10月，县级富阳市改为杭州市富阳区就顺利得多。

“杭州是省会城市，湖州不一样，市辖区单薄，

甚至比长兴县的经济还要弱。”高琳认为，发达地级市对周边有辐射带动的能力，能反哺设区的地区；如果非但不能反哺，反而要拿去更多，自然会招致县里的反对。

撤县设区会遭遇更多动力还是阻力，高琳归结为一句话：“到底是大马拉小车，还是小马拉大车？”

2014年1月，国务院同意撤销县级增城市，设立广州市增城区。一年后，《广州市增城副中心规划》出炉，广州承诺未来有4条地铁线通往增城。

李娜表示，县改区可以视作这项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县改区也可以做规划，广州也希望作为县级市的增城发展起来，但要成为一个整体，就需要通过县改区，把增城纳入到市一级的投资体系。广州市固定投资体系盘子就这么大，如果不纳入进去，你就有点像‘外甥’。论排期，肯定是先管完自己的‘小孩’，再管‘外甥’。”

广东经济较落后的一地级市，十年前将一下辖县改为区。该市一位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区的面貌十年来变化不大，仍是大片农田，不像城市。

“省里布置一项保护古村落的任务，会给县安排专项资金，但不会给区，区由市负责。市里面本来财政就弱，没有钱给你，但工作照做。”该处级干部说，十年前的县领导“账没算过来”，撤县设区后，区公务员实践起来才发现受到束缚，有时会私下抱怨。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近年来，部分地方撤县设区完成后，地级市会对县改区承诺，几年内行政管理权限和财税管理体制保持不变，如山东德州市陵城区、江西上饶市广丰区、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等。

“这就是博弈的过程，答应你几年的收入不用上交给地级市，不然县改区推动不下去。”高琳表示。

何方洪提到，在撤县设区规划阶段，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是风险评估，“看看群众会不会意见很大”。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云南省行政区划调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显示，如果责任主体“没有客观地预测到拟申请实施后可能出现突出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将对申请实行“一票否决”。这项制度自2015年8月1日生效。

县改区促增长，仅五年管用？

“走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在李娜的印象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是靠大量分权形成。分权最彻底的时候，村一级都享有充分自主权，圈一块地就能开工厂，收益纳入村级财政。

当分权开始引发恶性竞争、资源浪费时，政府开始寻求一种方法，促成资源的集中配置。

“撤县设区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合并就OK了，通过行政手段把资源集中起来。”新世纪初的撤县设区浪潮和现在一样，当时的宣传话语中，撤县设区被视作促进地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抓手”。

问题在于，“抓手”是否真有效？

李娜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徐现祥一起，收集了1990-2007年所有撤县设区的样本，比较这些城市在撤县设区前后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增长变化。

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在调整后的五年内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到第五年几乎降到零。

李娜认为，短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来源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撤县设区以后，先做空间一体化。修路、通地铁，把周边的交通先改善，原来市里面的一些项目也扩散到新地方来。”

以广州为例，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县级市番禺、花都改为广州市的两个新区。

“当时的调整有一定必要，因为之前广州的城区很小，已经没有地方扩展了。”设区后，地铁通到了番禺，机场建在了花都，“一个大的城市格局形成了，还是有作用的。”李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这种通过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效益，只维持

了五年。

李郁提供的一种解释是，撤县设区后，经济发展资源的规划权、审批权被集中到地级市层面，县改区政府几乎失去了对经济发展资源的控制，长期增长的动力消失。

广东民政厅行政区划调整首席专家、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清泉参与的一项研究，从区的视角分析了撤县设区的效果。

番禺设区前，一个项目从行政审批到落实只要20天左右；而设区以后，无论在规划部门、国土部门或消防部门，审批时间都是原来的2至3倍。

在设区后的几年内，广州市在番禺区划定了大面积的控制区域，但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动工建设，造成土地闲置。

研究还提及，番禺在承担众多广州市新的发展项目时，也承受着大规模征地和出现大批失地农民引发的社会问题。

十多年后，新一波撤县设区浪潮扶“新兴城镇化”而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

2014年，广州将最后两个管辖县级市增城、从化改设为区，从此和南京一样，进入“无县时代”。

和上一波浪潮相比，在地域分布上，这波“撤县设区”更多地从沿海席卷到内陆城市。李郁认为这是政策迁移的表现。“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看到有效益存在，我就学过来。”

至于两波浪潮的逻辑，李郁认为，没有本质差别：都是试图通过行政区划调整集中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行政区与经济区应脱钩

2004年，一波“撤县设区”浪潮甫息，《城市规划汇刊》登出一篇论文，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文中写道：“要特别防止刻意将城市经济区与城市行政区重合的做法，它在短期内可能有益，长

期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行政区划不可能跟随经济区一变再变。”

魏清泉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年过去，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周振鹤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表示，撤县设区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一体的表征。“我们的行政区与经济区从来就是挂钩的。而完全的市场经济似乎应该将行政区与经济区脱钩。”

“总的说来，我们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太多而不是太少了。总是因为各种需要，不停调整改变行政区划。近三十多年来，更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经常调整行政区划。这说明我们尽管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还不全是市场本身，而是有很多行政因素在内。行政因素作主导，就必须不断调整行政区划来适应，所以有县改市、市（注：县级市）改区的做法。”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基本的行政区划体系并不频繁变动，基本不存在调整行政区来适应经济区的问题。

周振鹤在《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一书中介绍：“行政区和经济区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内向的、封闭的，后者是外向、开放的。行政权力只能在一定边界范围内起作用，经济活动却不宜受到任何边界的限制。”

经常调整行政区以与经济区相一致，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就是这个缘故。“但是行政区变动过于频繁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李郁想到的办法是用“协商”来代替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协商之后有共识，协商完了有契约。通过协商，两个人的利益可以最大化。”而不同地级市、不同区县之间，甚至市与县之间也可以通过协商建立统一的空间、统一的市场，达到目前希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获得的经济效益。

“我们应该走向更多的协商，这也叫政府治理。”李郁说。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2015-11-12）

2015 撤县设市名单约 200 县排队申请



放开之后

新一轮设市建议“两个弱化”

要弱化量化指标在能否设市上面的决定性作用,还要有更细的监管,否则将意味着机构、官位和行政成本急剧增加。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60%的平均水平。大批完成实际“变身”的县,迫切等待撤县设市大门被彻底推开。

蔡建明认为,撤县设市冻结期,我国经济和城市发展都有很大提升和飞跃。解冻初期如果申请量有一个大增长,应是可理解的。

但一位参与标准制定的学者预测说,标准放开后,不会引起城市申请并喷情况。“十八大文件明确说要有序设市,要看它的布局条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提出有序设市以及制定这些标准,也是防止大家一哄而上,给社会舆论造成一种错觉”。

“为防止重蹈覆辙,这轮撤县设市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冯俏彬认为,上一轮撤县设市中,达到指标就可设市,达不到就“做到”。

“重新修改标准,只能作为一个门槛条件。新一轮撤县设市中,一定要有两个弱化。”冯俏彬建议,一是弱化量化指标在能否设市上面的决定性作用,比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达到多少、人口达到多少等。可以有指标,但绝不能唯指标论。

另一个弱化,关乎撤县设市和行政级别的直接的联动关系,这被冯俏彬看做“新一轮撤县设市中的重点问题”。

“撤县改市对很多官员来讲,意味着更大的权力,

更高的位置,更多的机构,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一切。所以,县改市在有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旦控制不好,背后意味着机构、官位和行政成本急剧增加。”冯俏彬提醒,不能把撤县设市单纯理解为简单升格。

蔡建明也提醒说,在实施中,撤县设市的监管一定要比过去更细。

“还是应先有一个设市预测与规划的顶层设计。可以由政府委托,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来参与规划设计。”蔡建明建议,通过第三方认证,确定优先设市的滚动推荐名单,再上报有关部门审批执行。

“如果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就有可能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干扰下,使得本应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被扭曲”,蔡建明说。

广东情况

“撤县设区”是主流

撤县设市,还是撤县设区?虽然都只是行政区划更改的“一字之差”,但从城镇化思路上来讲,两者可谓大相径庭。

从广东近年的情况看,“撤县设区”是主流,尤其是在粤东西北地区。在珠三角,“撤县设区”也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思路,一些已经完成“撤县设市”的县级市,再撤市设区的呼声很高。

粤东西北:“小马拉大车”现象普遍

在粤东西北地区,撤县改区多由地级市推动,扩大城区面积,增强对其他县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成为城市发展战略,获得省里明确支持,力争每市都有一个县改区,打造新的“百万人口级”大城市。近两年来,已有清新县、揭东县、潮安县、梅县、电白县、阳东县、云安县完成“撤县设区”,其他县也在紧锣密鼓推进。

【2015 年下半年已批设公布】 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地设市的名单

国务院最近已批准的还有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撤县设县级市
天津市静海县、宁河县撤县设区
江苏省大丰市撤县设盐城市大丰区
江西省上高县撤县建县级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撤地设地级市

但“小马拉大车”也是地级市抱怨的普遍现象。如潮州市在潮安县撤县设区后，市区面积从 152.5 平方公里增至 1413.9 平方公里，几乎是原来的 10 倍。户籍人口从原来的 35.1 万增至 160.4 万。梅县撤县设区后，梅州市区面积由 298 平方公里变为 3053 平方公里，也扩至 9 倍多。

“城区狭小的弊端是多方面的。”梅州市市委原书记朱泽君曾就此表示，一方面建设用地严重不足，搞得了城市搞不了产业，搞得了产业又搞不了城市。另一方面，环境容量小，产业难拓展，想建个污水和垃圾处理厂，都很难找到合适地带。

根据广东省城镇化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广东将依托粤东西北地级市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培育若干个 1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大城市。

珠三角：撤县设市后又想变区

与撤县设市相比，广东近两年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可谓高歌猛进，带来城市城区面积的大扩容。与经济强县独立发展的意愿相比，很多城市郊区的市县，更乐于融入大城市城区“傍大款”一起发展。

最典型的是从化、增城、花都三市变区，融入大广州。三地与广州主城区的距离都较远，融入城市可得到统一规划考虑，但又不碍于自身的城市布局。在心理距离上与大城市也拉得更近，公共服务配套

也将更加完善。

增城从谋划申报到撤市改区，历时 10 年，获批复后，当地房价应声而涨，被视作居住环境、交通配套等改善的重大利好。

【撤县设市大事记】

- 1983 年江苏常熟撤县设市获批。
- 1983 至 1986 年我国约有 100 个县成为县级市。
- 1986 年国家提高撤县设市门槛和标准。
- 1993 年国家再次提高撤县设市的要求。
- 1994 年 10 月中央发函要求各级停止“撤县设市”。
- 1997 年国务院批准最后一个撤县设市的行政区湖北汉川后，正式冻结县改市。整场改革历时 10 年多，超过 400 个县或者说接近 15% 的县升级为县级市。
- 2011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 2013 年吉林扶余、云南弥勒、青海玉树撤县改市。
- 2014 年云南香格里拉撤县改市。
- 2015 年四川康定撤县改市

(北京晨报)



学界叩问 7 年

政府账本公开有多难



(李伯根/图)

一项已坚持 7 年的民间调查——“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2015)结果显示,目前公众通过政府主动

公开或依法申请方式,可获得的省级政府财政信息,仅有 1/3 左右。

各省各部门公开信息的方式、时间、条件和内容,五花八门。拒绝信息公开的常用理由,通常是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

七年来,透明度平均分平稳提高,最低分也平稳提高,但最高分的变化却起伏颇大。课题组曾经专门研究过透明度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等因素是否有关,结论是没有规律可循。“这表明,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并没有制度性保障。”

2015 年 10 月 28 日,财政部监督监察局发布消息称,将对全国各地的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结果将对社会公布。

与此同时,一项已坚持 7 年的民间问题调查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名,也于 10 月 31 日发布。

今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得分最高的是山东省(57 分),全国平均分 36。也就是说,目前公众通过政府主动公开或依法申请方式,可获得的省级政府财政信息,仅有 1/3 左右。

这一结果与 IBP(国际预算合作伙伴协会)今年

9月刚发布的全球“预算开放度调查”一致,这份最具国际公信力的报告对全球102个国家进行预算开放度调查,今年中国排名倒数第11名,得分14(百分制)。

与中国同处20分以下的国家有17个,分布于撒哈拉沙漠或南非洲或中东及北非。

2008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后相关法规相继出台。近两年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更是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于预算公开,政府的承诺仍在层层加码。然而上海财大的财政透明度调查显示,结果仍难如人意。

“7年来,很多人会问,我们国家预算透明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它取决于我们的行动。”10月31日的报告发布会上,该课题组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上海财大教授蒋洪说,“我们该问的是,我们该做些什么?”

最好的“制度笼子”

“说把权力关进笼子,可笼子用什么材料来做?找不到一个比信息公开更好的笼子了。”

今年65岁的蒋洪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逾20年,曾任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也是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麻辣委员”,是他近年来开始为人所熟知的标签。

今年的全国两会中,一位共同参会的代表在微信朋友圈说,因为政协选举时,蒋洪给所有候选人都投了弃权票,理由是“不了解”,全场只有他高高举手。

蒋洪这样的“不合时宜”并非偶然。2000年左右,他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审议预算时他认为报告太笼统,没人看得懂,于是他每一次都投全场唯一的反对票。后来有人劝他能不能不要这样,蒋洪也不想为难别人,于是从此开始投弃权票。

从地方人大,到全国政协,蒋洪一如既往地看不惯预算审议的“走过场”。在课堂上,他曾给学生们模仿全国两会的预算审议现场:主持人问,大家是否还有不同意见?还没来得及举手,站在前面的

计票员就已经习惯性地高举双臂、相交于胸前,喊“没有!”

今年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曾在政协委员驻地采访过蒋洪,他说,预算报告就是一本账单,但我们的账单没让大家看明白。“你不能只告诉我教育花了多少钱,而是要说明白有多少适龄儿童、多少学校、多少老师,具体是怎么给他们花钱的,”他说,“笼而统之地说一笔钱,跟没说一样。”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课题组成员邓淑莲是蒋洪的博士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蒋洪一直都是“公共情怀”的人,从年轻时起就在思考如何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开,如何规范公权力使它不侵犯个人权益。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从公共产品理论探讨这一问题。

但蒋洪渐渐发现,公共产品理论作用到实践中边界并不清晰。“为了琢磨新的方法,直到2000年左右他都有些苦闷,平时说话也变少了。”邓淑莲说。

直到发现预算报告看不懂,触动了蒋洪,他认为中国的一个实际问题在于大家没有信息。恰好当时世界银行发布财政透明度的规范,与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契合。

蒋洪找到了苦寻多年的规范公权力的路径——监督预算透明度,“这件事既不和现有权力冲突,又能掐住限制权力的关键点,”邓淑莲说,“打蛇打七寸,财政问题就是政府的‘七寸’。”

财政透明度课题组负责人、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认为,现有体制下,信息公开是关住权力的最好的制度笼子,“说把权力关进笼子,可笼子用什么材料来做?人大?政协?找不到一个比信息公开更好的笼子了,它可以把内部监督转化为外部监督。”

只求公开,不辨真假

课题组只考察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详细程度,无法保证真实性。也就是说,只求公开,至于数字真假,并没有加以甄别。

从2006年起,蒋洪团队准备了两年,恰好碰上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给了他们政策依据。

条例规定,政府应主动公开政府公共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2008年,课题组首次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报告的信息来源分为政府主动公开的和课题组申请获取的两类。前者通过网络和公开出版物检索,后者逐一写信申请公开。

该报告的评估对象是省级政府。刘小兵说,最早他们想做中央部委,因为可以拿来做国际比较,但又觉得要小心一点,就绕开了中央。又因为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没有办法做市、县,就选择了省级政府。

课题组收集的信息一共有八块:公共财政的“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加上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政府资产负债、部门预算和直属国有企业信息。

每年,课题组向各省财政厅(局)、国资委、人社厅(局)和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以及部门决算涉及的11个相关部门发调查问卷和表格,同时收集政府部门主动在网站等渠道上公开的信息,并发回给政府确认。

课题组只考察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详细程度,无法保证真实性。也就是说,只求公开,至于数字真假,并没有加以甄别。

课题组团队有老师七人:蒋洪、刘小兵、邓淑莲、杨丹芳、温妍秀、曾军平、郑春荣。他们都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税收系或社保系的老师。7年来,这支团队只有过一两个人的调整。

每年这个课题要做半年之久,除七位老师外,还需数十名学生帮助查资料、打电话、寄材料等。据邓淑莲介绍,该课题的工作业绩不计入老师的任何考核,科研经费也是学校划拨的,只有10万元,每个老

师人均5000元。

“有意义就要做嘛,也不在乎说多少钱。”已参加课题组7年的财政系副教授曾军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头两年,课题组自己设计了有113项信息指标的问卷,邮寄给政府部门,一般会寄两次信,再进行电话询问及结果复核,每一次通信和询问电话都被记录存档。

2010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要求“通过主动公开渠道确实难以获取的政府信息,申请人可按照‘一事一申请’的方式,向相关行政机关分别提出申请”。

很多地方据此要求课题组“一事一申请”。于是,课题组要给各个部门分别寄出113封信,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只回复一封信。

最终的报告会成书出版,每年印刷量3万多本,课题组采购500本分别寄回给调查对象。

自2014年起,财政部要求全国各级政府编制决算报表,于是,课题组修改了问卷,将财政部要求编制的报表,加上还有课题组自己设计的决算表格,合并发给各省。

“从以前的地方提出,你们要的信息我们没有,后来我们就采取了财政部要求你编报的报表,再问你,你肯定没理由说没有了。”蒋洪说。

条例 VS 法律

各省各部门拒绝财政信息公开的最常用理由,是“涉及国家秘密”。

2010年,针对部门预算,课题组调查了31个省份的341个部门,只有18个部门反馈了信息,负责部门预算调查的曾军平副教授说,没有给出反馈信息的部门也并不麻木,他们遇到这样突然的调查,更多的反应是告诉上面。

各地政府,特别是税收、教育等部门,在收到依申请公开的信函和电话后,告到了中央一级机构。邓淑莲还记得当年的强力反弹,因为上海财经大学隶属于财政部主管,当时的财政部和教育部都找到了学校,时任副校长反问施压者,“你们觉得这个事

儿做得对不对？”最终，课题组得到了来自中央层面的支持，才平息下去。

风口浪尖上的时候，老师们有点担心，“别被抓起来了”。蒋洪沉默良久，“不管，继续搞，我觉得不至于这样。如果抓人，所有责任我来承担。”邓淑莲回忆，当时的氛围颇有些悲壮。

各省各部门拒绝财政信息公开的最常用理由，是“涉及国家秘密”。

“谁让你们干这个的？是不是窃取国家秘密？”刚开始调研时，课题组常接到这样的质问。有时同样一组数据，有的省份直接在网站公开了，有的省份要依申请公开，而有的省份说是国家机密，不得公开。

此外，申请社保基金公开时，有的政府部门说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不得公开；申请公开国有企业信息时，又说是企业商业机密。

资产负债是政府的家底，其透明度却最低。负责这部分调查的邓淑莲说，愿不愿意公开倒是其次，很多地方根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有多少。

2015年的报告中，这一部分平均分最低，只有9.78分（去年5.53）。其中，有7个省份直接给出了部分调查信息；15个省份让自行在网站查询；3个省份认为不属于公开范围；还有3个省份（广西、辽宁、新疆），认为这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

从法规来看，2010年的保密法修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国家秘密的范围，但对其范围的界定未做任何实质性修改，《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秘密具体范围的规定》、对政府预算秘密等级的规定也没有任何调整。

对此，课题组在报告中建议，为更好地保障社会公民对政府预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必要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将其升格为《政府信息公开法》。“现实中，《信息公开条例》只是条例，无法与法律对抗。”刘小兵说，“政府部门的保密意识比公开意识要厉害得多。”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认为，“有些

时候，往往对公民个人信息公开很强调，比如实名制，买菜刀都要实名。但对于政府行为来说，又特别强调保密。”

信息公开百态

“有时为了获取政府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我们竟然还需要动用私人关系。”

在财政透明度调查中，有一项指标是“被调查者态度”，占整体权重的3%。2015年，这一指标是九个指标中得分最高的，平均分70分。

但实际上，评分是武断的。蒋洪介绍，“只要给书面回复，我们就给100分，只要电话回复，就50分。有来电质问的，也计分。”

即使有回复，不等于给了数据和信息。比如有的地方回复的像外交辞令，“我们长期以来致力于信息公开，感谢你们的支持”，就是不给数据，也不说到底给不给。

还有一些地方虽然给了书面回复，但同时要求数据仅供课题组科研用，不得向第三方传播。对这种情况，课题组内部曾有争议是否算信息公开。后来决定算公开。理由是，“根据相关规定，一旦他们对我们公开，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公众公开。但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什么承诺。”温娇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也带来一些排名上的混乱：有些省份公众公开做得很差，对课题组配合却比较好，就得分高；有些省份网站信息较全，但不给课题组更多，分数反而不高。

课题组的七位老师，分别负责八类财政信息统计，其中，负责社保基金和国有企业信息的郑春荣，曾专门对这些年的调查结果做过详尽总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例如，同样是社保信息的网上披露，有的地方在网站的“公示公告”栏，有的是“新闻”，有的是“政策文件”，居然还有有的在“领导讲话”栏中。有的省的社保年报竟然全部是参保人数统计，没有一个社保基金金额的数据。

而有些省份的《财政年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历年鉴》是内部出版物，没有书号和出版社，根本无法购买。“有时为了获取政府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我们竟然还需要动用私人关系。”他说。

公布时间也往往很随意。比如养老金信息本应在一年终了的三个月内发布公告，但多地社保部门的信息披露滞后半年以上。河北省《2010年河北财政年鉴》的出版时间竟然是2012年1月。

还有些地方信息披露的方式不合理。《2010年陕西省社会保险信息》在该省的人社厅网站上无从寻觅，却可以在《陕西日报》上找到。

北京市人社局也让人印象深刻。课题组历年向其申请公开后，都会收到一份报纸。郑春荣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北京人社局今年的回复，其中写道，“该政府信息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并附纸质证明——一篇刊登在《北京劳动就业报》上的不到一千字的报道，该报道援引了《2013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情况报告》的数据，然而这份报告人社局却不提供、不公布。

“明明自己有一手资料，竟需要借用记者的报道来公开，既非正式公告，也无法律效力。”郑春荣说。

从各省提交的材料上，往往还能看出各个省份之间私下沟通的痕迹。温娇秀负责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查，本来按照财政部的标准格式，表格中不仅有本级信息，还有下级信息。但是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东三省”的回复中，都十分巧合地抠掉了下级信息，只留下本级一栏。这在31个省份中，是特例。

无规律的规律

有的地区试了两年名列前茅，发现并没有得到上层更多鼓励，反而得罪了同僚，于是大家都往中间挤，冒尖是偶然。

纵览透明度调查的七年记录，平均分有平稳提高，从22分到36分；最低分也有平稳提高，从15分到19分。但是最高分的变化，却没有规律可循，它的曲线图像一根任意摆动的绳子。

从2009年的63分，落到2011年的44分，2013

年又猛跳到78分，今年再落回57分。

2013年海南省拔取的历史最高分77.7分，当年的项目组组长温娇秀记得当时大家也很震惊，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海南省以“一事一申请”为由，原封未动地退回了课题组的问卷。随后课题组把问卷分拆，寄去113个信封，海南省居然按照113个问题回寄了113封信，若不是由于有些回复与问卷要求不符，海南省当年理应得到100分。

但有意思的是，只此一年，此后海南省不再如此回复，得分也回落至今年的44.5（排名第八）。温娇秀回忆说，2013年的排名公布后，海南方面曾给她打过电话，问海南为什么可以得高分，因为财政部要组织人到海南去学习，“他们有点紧张。”她说。

课题组曾经专门研究过透明度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等因素是否有关，结论是没有关系。以福建为例，2008年它在排名中居首，第二年掉到中间，第三年排名靠后，今年又跑到第二名。分指标中，国有资产透明方面，2009年排名并列第一的安徽和辽宁在2012年双双垫底；2009年垫底的内蒙古则在2012年排名第一。

“这表明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没有制度性保障，心情好就公开，心情不好信息不给你，换一个人可能又给你。”刘小兵认为。

7年来，课题组得出唯一的规律是，各省得分差距在缩小，最高分与最低分差距从2013年的5倍缩小到3倍。

邓淑莲分析，也许有的地区试了两年名列前茅，发现并没有得到上层更多鼓励，反而得罪了同僚，于是大家都往中间挤，冒尖是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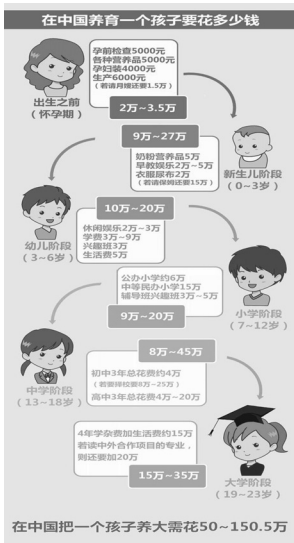
例如全国第一个“裸乡”——四川巴中白庙乡，把花的每一分钱都拿出来公示，“但是没有推广过。”在蒋洪看来，权力的天性则是逃避制约，这会使得先进者变得灰头土脸，“人家都骂，你那么起劲干嘛？”

（南方周末记者 张 玥

实习生 刘 冲 2015-11-07）

二胎政策开放世界各国育儿成本大PK

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出炉，引发各界热议。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育儿成本又有多高？



中国育儿成本有多高

据统计，在中国，从怀孕到将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需花费50万元到150万元人民币。

无论在哪个国家，为人父母者都会尽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因此育儿开销在家庭支出中占比很重。但在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同时，应在能力范围内衡量育儿支出，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合理规划家庭理财和保障，别让家庭陷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中去。

(腾讯大成网)

在国外养育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美国 24万美元≈153万人民币(不含上大学)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住房(30%)、孩子的照顾和教育(18%)和食品成本(16%)，用在孩子身上的开支随家庭收入增长而增加。

12万欧元≈82万人民币(不含上大学) **德国**

在孩子7岁以后，一般一半的育儿开销用于衣食等基本生活，一半用于教育、培训等软性投入。



加拿大 20万加元≈96万人民币(不含上大学)

这其中还不包括希望孩子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送他去私立学校及参加各种辅导班、才艺班的花费。

22万英镑≈211万人民币(含上大学) **英国**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教育支出和婴幼儿阶段费用，父母每年抚养孩子的费用约占其年收入的28%左右。



新加坡 34万新元≈152万人民币(含上大学)

政府对生育和抚养孩子都有大量福利性质的措施，学费也很低，但因父母工作压力等原因大多数家庭也不愿多生育孩子。

3千万日元≈155万人民币(含上大学) **日本**

不含教育费22年间抚养费大约1600万日元。而教育费相差巨大，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上私立学校的花费是公立学校的三倍。

各国育儿成本大比拼

中国的育儿成本高昂，导致许多人不愿生育二胎。那么，在不限制生育孩子数量的其他国家，把一个孩子养大又要花多少钱？

青年毛泽东

曾将何职业作为自己的志向

核心提示：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靠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可见，当记者曾是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之一。



青年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江卉李霞王婵媛，原题为：《当记者曾是青年毛泽东的志向》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我党的机关报，在《人民日报》之前，还有一份叫《向导》的周报。《向导》诞生于1922年9月，是当时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帝反封建军阀”旗帜的报刊，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

一盏明灯”。该报在内地大中城市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0万份。1927年7月18日，因国民党叛变革命，出版201期的《向导》被迫停刊。

作为我党首张机关报，时过境迁，现存的报纸非常有限，合订本更为稀有。黄石市档案馆却珍藏着《向导》合订本的前3集（共5集），对研究中共党史及大革命时期时局具有重要意义。

翻开合订本，跃然纸上的都是熟悉的名字：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还有湖北籍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们以笔为枪，为革命大义而战斗。

1923年夏，青年毛泽东热烈时评

1923年7月11日至8月29日的50天中，毛泽东以“泽东”、“润之”为笔名，先后撰写了《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11日第31期见报）、《省宪经与赵恒惕》（1923年8月15日第36期见报）、《英国人与梁如浩》（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纸烟税》（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四篇共计5000余字的时评。

这些时评少则七八百字，多则两千余字，分析独到、见地深刻。

《北京政变与商人》，被认为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篇目。文中说，“这次政变发生了，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初步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统

一战线思想。《省宪经与赵恒惕》从当时《民国日报》报道的赵氏花钱请民众游行维持省宪的事入手，揭示赵恒惕惨杀劳工、向商人勒捐、向农民提征田赋的行为，文中说，“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

毛泽东或痛斥，或抨击，或疾呼，笔调辛辣凌厉。《省宪经与赵恒惕》这样结尾：“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纸烟税》嬉笑怒骂：“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开宗明义：“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4篇时评，我们看到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忧国忧民，嫉恶如仇。

1926年、1927年，毛泽东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农民

另外两篇调查报告，则展现出青年毛泽东脚踏实地、心系群众的赤子情怀。

很多人以为江浙两省是富庶之地，毛泽东实地考察，“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926年10月25日第79期见报）说，“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忧惨愁苦的状态。”

1927年3月12日第191期见报的《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的名篇。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34岁的毛泽东32天步行700多公里，深入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地，采访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乡绅等，形成了长达1.7万字的报告，客观评价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报告中，毛泽东笔触遒劲有力，行文气势磅礴——

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革命的路口迅跑……

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

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靠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可见，当记者曾是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之一。

从青年时代主编《湘江评论》开始，到后来成为领袖人物，毛泽东为党的传媒写过大量社论、政论、杂感。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名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因此，毛泽东也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

编后

勿忘人民，这是著名记者穆青反复强调的。腿勤、脑勤、手勤、嘴勤，这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先生给合格记者的定义。作为记者，俯仰天地，能胸有大局大事，扑下身子，能感知民间冷暖。无疑，青年毛泽东在《向导》上的所思所行，为记者编辑们上了生动一课，是当下新闻战线“走转改”的鲜活教材。

（2015年11月09日人民网 江 卉等）

朱大可： 国学应从孝顺进化到孝爱

【摘要】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二十四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朱大可在2015腾讯冬季思享会现场演讲

2015年11月24日，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在京举行，来自各行业的十余位学者、文人共聚一堂。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国学进行了一场演讲，提出了他判断国学优劣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下为朱大可先生的演讲全文：

很高兴受邀在这样一个场合谈一下我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话题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新文化运动整整100周年。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后来改名为《新青年》，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有两个口号（德先生、赛先生）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放弃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古老的、专制的帝国去投身到这个世界的行列，这是一个伟大的努力。经过全体中国人100年的努力，我们向伟大的历史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没有人能否认这一步的重大意义。

说到中国今天流行的国学，我有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今天国学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常被邀请去参加企业总裁国学班讲课，我每一次都是去砸场子的，砸了他们的场子他们不太高兴，

因为我所讲的话跟他们期待听到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国学现在已经沦为心灵鸡汤，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状态。

我觉得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学：一种国学是顺从的、奴性的、自我封闭的，拒绝反思，拒绝自我批判，惟我独尊的一种国学；另一种国学是批判地、反思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毫无疑问，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种国学。

我二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就是想搞清楚，中国的国学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想问一下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此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当时写作这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判断两种国学的四个标准，我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国学是多元的，不是独尊某术的。

我特别害怕汉朝的独尊儒术的状态，形成所谓的儒家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学一定会走向它的绝路。国学它首先是丰富的思想宝库，当然现在大家一般来讲，我们本能在上认识的所谓国学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加上道家，有的时候加一点兵法，加一点易学，如此等等。但实际上这个都是过去讲的汉学的部分，我们有没有想过国学和汉学为什么是划等号的呢？

到今天为止我们有谁去研究过藏学、研究过彝学、蒙学，这种有文字根基的少数民族的学问吗？没有一个国学家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这难道不是我们国学的一部分吗？我们到今天为止，所有的所谓国学都是汉字共同体的衍生物，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国学是祛魅的，而不是用来造魅的。

国学不是完美的，国学的继承要进行有效地过滤。现在很多大学逐渐成立了国学院，国学院的领导人——我们称之为领导人——那真是穿着对襟大

褂,留着胡子,行磕头拜师之礼。这是干什么呢?这就是造昧。中国学说的现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种每一个字都是经典,需要膜拜和赞美,但是绝对不可以质疑的态度,不是国学本身应有的态度。

因为国学,尤其是儒学,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清洗。随便举个例子,古文《尚书》,就是儒家自己提出来质疑的,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晚清,最后被证实就是伪书。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二十四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还有兵法三十六计,我们在机场看到的全是“鬼谷子下山与商战”、“三十六计的谋略”诸如此类的书,这些谋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还有,所有的媒体都在支持说我们要孝顺,央视做了个洗脚广告,从此全中国掀起一片洗脚浪潮,成千上万的人集体洗脚,想干什么?这种我们讲的孝,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的所谓国学的孝,它的伦理精神是把“孝”这个子女对父母的平等的爱,引向顺从。所以我们阐释的传统的国学在孝上面真正的意义不仅是“孝”,也是背后那个“顺”字。为什么我们不该孝爱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孝当中的“爱”当成孝的主题性精神,而恰恰把“顺”作为它的主体呢?这一方面是孝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阐释当中出现的严重的偏差。与其让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样磕头,还不如让他挺起脊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主体性的独立和健康人格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这种洗脚式的表演,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把它抛弃吗?

第三个,国学是开放的,充满吸纳性,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

就先秦而言,先秦的这些思想很多都具有明显的外部原型。在我的书里面,我提到老子的学说有明显的印度吠陀教的影响,孟子的思想也受到外部明显的影响,这个有待考量,我提出了大量的证据。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秦始皇的智囊。学者都认为秦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国,是商鞅变法的结果,但其实不是。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做出了更进

一步的证明,连那时大量的器物制造工艺都是来自西亚。最近西北大学的学报发表了考古学家的论文,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它是从考古学的立场、角度,重新审视秦帝国的文化和文明制度的来源。

如果我们拒绝去探索这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个西方是指亚洲西部——作为亚洲共同体的内部的交流,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春秋战国时期突然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大爆炸。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合逻辑。

我个人认为开放和吸纳就是国学的生命力的源泉。

第四个,国学是独特的,即使它有外部来源,它仍然是独特的。

因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创造,这一点毫无疑问。老子的学说跟印度原先的吠陀教并不尽相同,如果你不做细致的辨析,你是无法找到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的。

但是,它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我经常听到那些国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学是用来跟世界全球化对抗的一个盾牌,是我们用来抵制他们的,把中国跟世界区分开来。如果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防御性的武器,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中学和西学不是对抗的,它们是互补的。像以前在谈论中医和西医的话题一样,青蒿素这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再一次引爆了所谓的中西医的论争:青蒿素属于哪种医学?其实两个都是,它中医的原点是出自道教,但是它的提炼方式是西医的。所以一个伟大的东西一定是互补的结果,我们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而是简单地放置到一个简单的状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现在的这种分裂,把国学和西学作为两种互相对立的元素,这样一种立场我认为是一种伪国学。

我想跟大家最后讲一个卡夫卡的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他写了一种洞地洞,讲一个无名的动物在地洞里面不断地感觉到有一个外部的威胁在逼近,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坑道,改变它居住的洞穴,不断地填掉这个再开挖一个新洞,他不知道无名的方向是来自什么方向。

这是卡夫卡的恐惧,也是很多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办法摆脱的一种恐惧。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拒绝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们不是21世纪的东亚文化鼯鼠。(腾讯文化 朱大可 2015-11-24)

1911年，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一）

【摘要】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作用更在于实际的军事及政治行动上。请愿国会运动、开放党禁运动、联合满清贵族、策动“滦州兵谏”、发布“十二条政纲”、提出“虚君共和”方案等，皆是梁氏的大手笔。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封密信中的政变计划

1911年10月21日，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10月10日）后，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字君勉）一封万言密信，详述两年来与满族亲贵来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宫廷政变计划：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

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嫖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赛、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复与袁结，务欲蹙涛于绝地。……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人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0-362页《梁启超致徐勤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用简称）

这封密信，是解开1911年梁启超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证据，也为梁启超参与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证据。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军倒政府”，即是梁启超于辛亥年前即谋划已久的运动北洋军倒内阁（即皇族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进行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政变的具体内容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谏议局全数议员充当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

和袁，即与袁世凯言和；慰革，即在与袁世凯讲和的同时，安抚、稳定革命党；逼满，逼迫清帝退位；

服汉,即以此令汉人信服,同时给汉人和满人权利一个完整、平等的交代,也即以君主立宪的形式开启新的国体和政体。政变计划的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核心是“和袁”,即用北洋新军控制北京局势,以袁世凯统治取代清王朝摄政王载涛的统治,策略是通过政变,以立宪派控制国会,进而掌权。

信中所说的“涛”,指军谄大臣载涛,“洵”指海军大臣载洵,“庆”指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泽”指度支部大臣载泽,“老摄”即光绪之弟、溥仪之父、监国摄政王载洋,此五人者,皆满清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陆军、海军、财政大权。其中,载涛、载洵、载泽皆主张君主立宪,但载涛、载洵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载泽则倾向于张謇、郑孝胥立宪派,但载泽与载涛权争日久,而载洋虽然也为梁启超所拉拢,但软弱无能,实际权力掌握在奕□及载泽等人手中,而奕□与袁世凯为同党,是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故所谓的发动宫廷政变,“勒禁卫军驻宫门,逐庆、泽”,即是以载涛所掌握的禁卫军驱逐载洋、奕□、载泽等顽固派势力,并以载涛为总理。“杀盛”乃是指除掉当时力主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而引发全国骚乱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继而召开国会,由立宪派所控制的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充当国会议员,逐渐向国会过渡。

此外,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梁启超亦有详细布划:“国会晓諭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诏,满清交出政权,废八旗制度,改汉姓,满人照例赐姓,以消除怨毒。

当然,由于是绝密军事计划,故此,梁启超在此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所谓的“非常可观之事”,即是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当然,这其中,袁世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即政变之后,必须要由袁世凯出山与立宪派共同主持大局。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康、梁立宪派一直将“除袁”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就私而言,袁世凯是戊戌变法的告密者,除袁,乃是为戊戌死难的六君子报仇;就公而言,袁世凯是康、梁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康、梁与载洋、载泽等与袁世凯有私仇的满清权贵在除袁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康、梁的这一计划,一直未能见明显成效。

尽管除袁是康、梁立宪派一直积极谋求的长期计划,然而,在辛亥前夕,关于联袁、除袁,在立宪派内部是存在分歧的,尤其是康、梁之间分歧甚大。事实上,梁启超一直有试图联袁的计划,但康有为则坚决除袁。随着时局的变化,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关系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在康、梁看来,袁世凯野心勃勃,是清末实行立宪的最大政治障碍。然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又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又是清末最具政治魅力和政治实力的政治人物,收拾清末的乱局,不得不借助袁世凯,可以说,袁世凯是清末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十分惧怕的人物,尽管表面不愿意承认。尤其是在梁启超看来,立宪派既要打击袁世凯,又不得不与袁世凯合作,当没有更好的政治合作对象时,则不得不联合、依赖和借助袁世凯,进而与袁世凯合作,试图借助袁世凯政权来实行立宪。所以,梁启超的计划中,“和袁”是首要。

于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康有为改变了策略,但康有为支持袁世凯的前提是,不能使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也即不能走革命党的武装暴动之路。这样,也才有了“滦州兵谏”这样的非暴力政变计划。

梁启超秘联“北洋三杰”与满族亲贵

政变的关键在于控制军队。

事实上,具有战略眼光的梁启超,早就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而且与北军中诸要人早有秘密往来。北军中的三个人物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很早就进入梁启超的视野。梁的政变计划中,具体所借助的,

即是张绍曾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时张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驻防保定的北洋新军第六镇以及蓝天蔚驻防奉天(沈阳)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张、吴、蓝所统领的部队,不但是北洋军最有实力的力量,而且驻扎京师附近,对于拱卫京师有着特殊的作用。梁启超之所以考虑动用这三支军事力量,一是此三人于革命党及各路江湖人士有密切联系,二是这三支部队对于牵制京师、安抚南方革命党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被誉为“北洋三杰”,在军界颇有名望,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多赞成和支持君主立宪,并由此成为康、梁立宪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此三人私交甚笃,又都参加过同盟会,与革命党人有广泛联络。

宫廷政变的对象是清廷的旧派。其代表人物是奕□、载涛、盛宣怀等,皆为袁世凯死党。新派反对袁世凯出山,主张君主立宪,与梁启超关系至密,代表人物除载涛、载洵外,还有军咨使良弼、民政部尚书善善等,在康梁立宪派的策动下,他们极力扶植新军领袖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以壮大势力,压制袁党。光绪死后,梁启超抓紧派人活动载涛等握有军权的上层人物,使宫廷政变的密谋逐步成熟:一方面抓住宫廷禁卫军,一方面抓住近畿“新军”领袖,京南是驻保定的吴禄贞,京东即是驻滦州的张绍曾。

为了实施此计划,1910—1911年间,梁启超曾派汤觉顿、许佛苏、罗癭公、麦孟华、徐勤、潘若海等派人先期在国内及京中运动,并派汤觉顿秘密潜回奉天、大连等地,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北军中要人联络。为谋开党禁、归国理政,两年之间,梁启超联络的朝廷亲贵及地方督抚大员即有载涛、载洵、载涛、良弼、张之洞、袁世凯、张鸣岐、岑春煊、赵尔巽、端方、戴鸿慈、善善、张謇、汤寿潜等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加紧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步伐,派人回国积极运动,幻想凭借国会之力控制政变后的京中局势,夺取北京政权而挟制天下;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拟运动南方地方督抚自立以杀革命

党之势,“声称其不接济北军,如是则革命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从吾策”(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梁启超的策略是通过运动地方督抚自立来控制革命党的势头,只要地方督抚不接济北军,则革命党就会引以为友,这样,北京孤立,自然给立宪派控制京中局势带来了机会。

1911年春,陆军部所属“军咨处”升格为“军咨府”(相当于后来的“总参谋部”),载涛为首任“军咨大臣”,“永平秋操”就是他就任后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正是集结新军除掉旧党的大好时机。当然,此密谋鲜有知悉者,连梁启超在给立宪派骨干徐勤的这封信中,也只是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徐勤求他明言,梁回信:“议事秘密,不欲道尔!”直到武昌起义后,他才告诉了徐。

“滦州兵谏”与清廷的妥协

事情源于北洋新军第六镇的秋操演习。

清军准备于1911年6月(实际日期为9月16日)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一次秋操准备会议上会面,密商:“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人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

是年8月,梁启超由日本密函在京立宪派骨干,告知“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所指即是通过“滦州兵谏”实现宫廷政变。可以说,“滦州兵谏”由梁启超一手策划,但为了保密,他在信中并未详细提及。9月16日,摄政王载洋校阅禁卫军,准备秋操。此时,同盟会与立宪派双方均加緊部署起义。

正当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摧毁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举国震动。(待续)